2012年3月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衣卓明 美术编辑 王丹华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青年时评

投稿信箱：qnbtgb@vip.sina.com

PM2.5，指数后续更值得期待

□耳东每

2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标准增加了细颗粒物，也就是PM2.5和臭氧8小时浓度限值监测指标。根据计划，2012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细颗粒物与臭氧等项目监测，并在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PM2.5是什么？恐怕很多人还说不清楚，但大多清楚这是一个牵涉到空气污染的指数。随着一些公益人士、专家和媒体的推广，政府部门终于有了决心在全国推广PM2.5。指数的推广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的民间推广和教育过程，这对于从劳动密集型谋求转型的中国经济来说亦是重要的。推广PM2.5有了一个时间表，看似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其实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即使是PM2.5在全国范围内都执行了，也只是一个环保手段，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我们呼吸的空气是相对干净的。

为了经济的发展付出环保代价，然后再用几倍的精力来弥补这个过失，这样的事情从西方到东方一直都在发生。如今的中国政府终于开始在经济之外关注环境以及环境问题引发的民众健康问题，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是一种进步。PM2.5的推出，表明了政府部门敢于面对此前几十年建设中背负的环境债，不过这个指数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公布而公布，与其说是公布给民众看的，不如说是公布给决策层看的。空气作为常规生命体的必需品，没有人能够选择“用或者不用”，每个国民的肺都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应该参考该指数推出环境保护、恢复的相关工程，这才是该指数的真正意义。

PM2.5的千呼万唤始出来，这番过程到容易让这个配角喧宾夺主。如果说PM2.5让人感到迷惑，以至于遗忘其根本目的是“净化空气”，那么不如推出“呼吸道恶性肿瘤指数”，虽然吓人，却能警醒世人和政府部门：环境保护的事情，不管指数推出与否，都在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着，刻不容缓。

》短评快

李宏宇 绘

残奥奖金不能是笔糊涂账

□梁江涛

2005年，中国女子长跑名将孙英杰因向教练王德显讨要奖金一事而轰动体坛，如今，她的丈夫汪成荣又因为奖金惹上了麻烦。因汪成荣所带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省体育工作一大队要求汪上交奖金由组织重新分配，汪成荣不同意。2011年12月28日，青海体工一大队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据《新京报》）

汪成荣是否该独享这笔奖金，似乎各有各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事先单位并不知道汪成荣拿了多少奖金，而中残联也只是在事后的一份函件认定，汪成荣拿的149.91万元为“教练员奖金”。试想，发奖一方如果在事先就将奖项的设定、评奖的标准、奖励的对象和奖金的分配等细节以通知的形式公之于众，就不会出现如今的争抢，也就不会将获奖本人和所在单位都置于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奖一个教练员就超百万，此番奖项的盘子到底有多大？中残联何以拿不出一个详细的分配章法？

残奥百万奖金不能成为一笔糊涂账，否则，突出贡献者会觉得委屈窝囊，其他参与者会觉得不公平、不阳光，挫伤体育界致力于残奥事业的积极性。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厘清这笔奖金的来龙去脉和真正的得主，中残联必须积极回应，出面将奖金的事说清楚，同时打开账本，让公众看个明明白白。如果在这次奖励中确实存在大头小尾只重奖教练员、忽略其所在单位的贡献，应予以立即纠正。体育界利益争夺的盛宴背后，其实是民众公共财富再分配的博弈。要想在体育赛事中消除奖金引发的纠葛，体育主管部门应从制度源头上定下规矩，要求每一个奖项的评比过程都必须在阳光下操作，以减少类似纷争，防范体坛腐败。

真公正未必需要回避

□钟学城

2月29日下午，广州市水价调整方案听证会召开，这是广州市依据新颁布的《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试行办法》第一次召开听证会，国家机关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组织的在职工作人员(含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合同制雇员)不能担任听证代表。

（据《人民日报》）

公职人员回避听证会，看起来是为显示公平，但从以往看，听证会里或多或少都有公职人员听证代表参加，但不管公职人员代表是赞成还是反对，该涨的还是要涨，既定的提价方案一点也不走样。以往“听证会”总是“一人反对”成为普遍，并非是公职人员参与的原因，而是：一是程序上的不合理，如“按照有关规定，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人总数的五分之二。而其余五分之三是内定人员，这就从人数上为涨价先行奠定了基础。这样的听证会即使全部听证代表不同意又能怎样？二是事先提出的方案都是涨案，无非涨多涨少的问题，不论哪种结果，都是涨；三是请托参与，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得到更多的赞同声，一些地方还出现“价格听证专业户”，如“成都四名‘价格听证专业户’”遭曝光，对涨价投赞成票。其中一名老妇，在随机抽签的情况下，7年里一共参加过19次听证会。像此种作弊行为，即使禁止公职人员参加又能怎么样。

真正要做到听证会公平公正，应该是从源头入手，在程序上、方案上改革，涨价方成本公开，利润公开，把涨价的原因说清楚，参与人员不拘职业，不分对象，一视同仁，让公众来议，真正听取公众的意见，而不是简单的不让公职人员参与。

》一吐为快

领导公开电话何须勉强

□刘义昆

近日湖南湘潭市政府在《湘潭日报》以及湘潭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布了36个市直部门共508名领导干部联系方式。短短半天后，湘潭当地的一些网站就删了相关信息。湘潭市政府部门知情人士解释道，有领导说网上就不要搞了，怕外地不相干的人看到了，乱打干部们的电话。

（据《法制日报》）

对于网上“得而复失”的领导联系方式，网友的反应颇为激烈。有网友甚至说：“怕骚扰你当什么领导”。这话有些激进，但并非毫无道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是我党的一贯传统。而加强与民众的关系，则本应是现代政府及其官员的基本理念。在媒体的强烈关注、网友的激烈炮轰后，是否将领导电话在网上继续公开，是摆在湘潭市政府面前的迫切命题。

问题在于：倘若当地政府不愿意在网上公开电话，即便网友们在努力之后勉强得来，又能产生多大效果呢？是的，删除已经上网的领导电话，无疑是一个败笔；而“有领导说网上就不要搞了”这个解释，则让人感觉湘潭市政府的公开举措，并非那么心甘情愿。

心不甘、情不愿地公开电话，能有多大意义呢？这些年在媒体上，我们早就领教过很多“一问三不知”的官员。而各级官员应付来电来访的花样，同样也是层出不穷。基于一些官员的表现，即便在报纸乃至网络上公布了电话，他们恐怕也很难通过民众来电来信，真正去探查民意、解决问题。是的，领导给不给电话勉强不得，能否为民办事更勉强不来。

老百姓为何要领导的电话呢？这是个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啊，倘若事情能在政府对外窗口解决，麻烦能在公检法得到公平处理，老百姓何苦要领导电话呢？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信访不信法”的表现。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曾指出，人们解决纠纷“信访不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的，所谓“信访不信法”，其实质是只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这不仅会使各级官员疲于批示，更将政府日常机构置于可有可无之境地。

湘潭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回应说，他们对这次公布领导干部联系方式一事也不是很知情。《湘潭日报》以五个整版公布领导联系方式，当地宣传部门居然“不是很知情”，这是何等“推诿”。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近四年，已经上网的领导电话却又删除，这又是何等荒诞。《条例》要求“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网上“得而复失”的领导电话再次表明：“主动公开”仍是空中楼阁。

几天前，张家界市纪委书记汪业元发出一条微博，附上了个人公开承诺书的照片，内容包括个人手机号码、办公地点、电子邮箱、认证微博和工作情况发布网站等（2月27日《中国青年报》）。汪业元因此被称为“官场另类”。在我看来，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直至为人民服务，依靠官员的“另类”或者道德自觉，是很不靠谱的；它需要一个健康的权力运行与监督体系。

我认为，不论是官员主动公开电话，还是政府主动公开信息，抑或是改变官员“权大于法”、民众“信访不信法”的局面，都需要对权力运行、民主监督重新进行顶层设计——也就是，要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当然，这需要人民日报所言“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政治决断。

80后美女教授“证伪”了什么

□佘宗明

1982年出生，29岁就当上教授。近日，武汉大学的“实力派靓女”袁荃在网上走红。校方称，袁荃的教授职称不属于“破格”。“诡异”的是，网上竟少有质疑论调，基本上都是褒扬。不少网民感慨：传奇就在你我身边”。（据江西电视台报道）

在此之前，有个说法甚嚣尘上：这是个没有佳话的时代，在国人的“质疑综合征”下，什么都会被拉上舆论烤架，接受世俗拷问。而今，美女教授袁荃的际遇，却宣告了此断言的纰漏百出——原来，佳话依旧存在，“逢神迹必猜疑”只是伪命题。

在信任断裂，共识钝化，公共场域已裂变为“万人对万人战争”的流沙格局的语境下，袁荃式传奇，有些来之不易。她不像是唐骏之流，在商业社会，凭着创富神话和营销式包装走红，没有兜售“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成功学名言，却是在学术领域斩获佳绩，为人又谦逊低调，又怎能备受追捧？再者：“80后美女”与“教授”头衔的不搭调，竟在她身上聚拢，也出乎人的惯性想象。

按常理说：“神话”崛起，质疑声也会一窝蜂涌过来。猜疑话语的集束，会笼罩在袁荃头上。你想想，依循常识化联想，80后不破格，当教授的概率有多大，何况还是高学历美女，何况在化学领域卓有成就，这俨然是“500万大奖砸在头上”的几率。按网民“拔萝卜带泥”、按图索骥的风格，舆论风声早朝着“官（权）二代”、潜规则的方向，发酵去了。

可这次，为何没见质疑如潮？要知道，若将情境置换，将袁荃换成某“80后市长”，早就沸反盈天了：“他爸是李刚”或“权色交易”的判断，会充斥于公众耳际。在民众既爱“造神”、又动辄喊“打倒”口号的氛围里，袁荃何以幸免？

还是得回到那句庸常道理上——猜疑止于公开。在校方网站上，袁荃的简历清清楚楚，没有选择性透明，更没捂盖子：留学海外名校，勤于耕耘，硕果倍出，受到国际认可等，没掺什么水分，没有浮夸之词，让人信服。

袁荃的“真”，还表现在她的身份认知，不仅是个出类拔萃的教授，还是个个性丰满的平常人。稚气尚存的言语，不恋浮名的气场，都生出亲切感来。“实力派靓女”的范儿，重塑公众对教授“脸谱化”的印象，也满足了许多人对佳话的向往——职称评选，不必论资排辈；“年轻教授”，不复幻象。

质疑，或许只是件棉衣，当信任的“气候”趋暖了，脱下来是必然的。